红色账簿

1921—1927

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

马祥林／著



革命需要枪，更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确实为中共建党提供过可观的经费，但党的领袖也曾明确拒绝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

苏联？

当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最需要财力支持的时候，苏联顾问却坚决拒款——

绑架？

在革命暴动初期，为了解除小工商户和贫苦大众的负担，周恩来等人坚决贯彻了"只要有钱，不问出处"的筹措军饷方式——

税收？贸易？

尚未建立稳固的政权，靠税收和贸易更是无从谈起——

深度解密中共1921—1927年的"创业史"

破译红色革命的财富密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红色账簿

马祥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导语 3
楔子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4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6
第二章　输血与造血 12
第三章　工人运动的效益 20
第四章　金钱是一面镜子 29
第五章　殉道的代价 35
第六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0
第七章　没有外资也要干 48
第八章　第一记重拳出击 55
第九章　南下广东的生意经 61
第十章　战斗与非战斗消耗 67
第十一章　“只要有钱，不问政策” 73
第十二章　财尽人未散 79
第十三章　三河坝留下的本钱 84
第十四章　第二记重拳出击 90
第十五章　本钱一个师 98
第十六章　破财消灾 104
第十七章　代价高昂的“学费” 111
第十八章　谁来掌舵？ 118
第十九章　井冈山的经济学 125
第二十章　第三记重拳出击 134
第二十一章　“红布指数” 141
第二十二章　中共中央否定了军队施行薪饷制 147
第二十三章　广州大逃杀 153
第二十四章　红色起跑线 159
附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162

导语

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党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相对弱小的在野党，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的过程。

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民解放军战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不拿薪饷的军队，打败拿薪饷的军队的过程。

那么，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呢？金钱和战争与革命的事业，又是怎么样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呢？

财富既是战争的因，也是战争的果；一切的纷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同时就是夺取国家资源的过程；货币战场上的厮杀，比起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毫不逊色。

历史有如账簿，红色的历史就是红色的账簿，历历在目。

本书从新角度诠释红色历史，力求使读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共产党创业的历史。

楔子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公元 1775 年 4 月，英国殖民地——北美马萨诸塞州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

小镇银匠勒威尔突然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军人，正向波士顿附近的康克德进发，那里是北美民兵组织“自由的儿子们”的秘密军火库，囤积在那里的枪支弹药，正是用来对付英国殖民者的。

作为一名手工艺人，银匠勒威尔是众多不满英国殖民地经济政策者中的一位坚定分子。

十年前，英国由于在对法国的“七年战争”中军费负担过重，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所有印刷品，如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报刊等等，都要向英国政府交纳很重的印花税。比如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需要交两英镑的税。

在北美民众的强烈反对下，英国议会表面上取消了《印花税法》，却又代之以收税更加广泛的《唐森德法案》，收税的范围扩大到玻璃、纸张、铅、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由此酿成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人民暴力抗税，英国政府于是增派军队，准备大打出手。派往康克德的这队英军，就是准备秘密抄北美抵抗组织老巢的。

银匠勒威尔飞马报信，不久之后，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小镇来克星顿打响了！

美国独立战争，货币成了直接的导火索。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战火中，“世界货币”美元呱呱坠地。

1775 年 6 月 22 日，“大陆纸币”诞生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元。独立战争是因钱而起，领导美国人民的“大陆会议”决心不再以征税的方式筹集军费。战争初期靠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借钱打仗，但向别人借钱总不是长远之计，大陆会议的领袖们决定：直接制造美国人民自己的货币，将战争的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一版美元只印了二百万元，颜色以绿色为主基调，取名为“Dollar”（中文发音为“刀乐”，有点“横刀而乐”的意思），因此被民间戏称为“绿刀”。二百万元的“绿刀”对于独立战争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此后美国各州都开足马力，拼命印制和发行美元。截止到 1776 年 7 月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仅一年时间美元的发行量就翻了近八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之巨。

二百多年前的一千五百万美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美元的信用越来越低，每天都在贬值，引起通货膨胀是必然的。美国的老百姓不愿意使用。美国政府一面教育人民要热爱自己的货币，一面采取强硬手段强制美元流通，规定凡拒绝使用美元者将被视为卖国贼，财产将被没收。据统计，独立战争百分之五十七的经费是通过发行信誉度极差的美元筹集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取独立和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美元持续贬值，美国人民虽然爱国，但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1779 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三年之后，驻康涅狄格州的两团美军士兵拒绝接受美元作为军饷，美军统帅华盛顿将军束手无策，只得向法国借了一笔法郎发给士兵才平息了事态。

由此可见，货币是战争的血液，失血的战争是坚持不下去的。战争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货币战争”。

血液的颜色是鲜红的，失去了鲜红色彩，战争历史将会缺乏亮丽的色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光斗转星移，历史的目光转向 20 世纪的东方国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争，较之美国独立战争更为复杂曲折，更为波澜壮阔，同样也离不开货币的血液。一部红色革命史，就是一本本“红色账簿”。

故事从一艘客轮开始……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公元 1921 年 6 月 3 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 1919 年 3 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 1920 年 3 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若论起对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更深刻的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海归”。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 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本科。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他学的又是“政治”。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 年 2 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长期欠席”。所谓“欠席”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

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守常”就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 24 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

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 1921 年 7 月 23 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 7 月 1 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

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六年之后，叶挺、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商量南昌暴动，也是选择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栋，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瞭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们坐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船之前，王会悟已经在中舱里备下酒菜，还同时准备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和麻将牌，这些是掩人耳目的道具。这体现女性特有的细心之处。

当画舫驶离了南湖码头的时候，大家总是感觉跟湖上其他画舫相比，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

缺的是歌伎。没有歌伎的画舫，在南湖上显得有些另类。但凡是肯花钱租画舫的都是有钱人，玩的是文化情韵，没有不请歌伎以佐诗兴酒兴的，桨声伴着江南丝竹和娇媚的吴侬软语，才别有一番情调。

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请寻常的烟花女子登船呢？

正在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时候，随着一缕脂粉香气，一位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朝代表们嫣然一笑，楚楚动人。定睛观瞧，这位歌伎打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鄙的人。”自古风尘多奇女，“擂鼓战金兵”的梁红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救北京于兵燹的赛金花、掩护蔡锷逃离袁世凯魔爪的小凤仙等都出身风尘。如今新婚不久的年轻知识女性王会悟，客串歌伎，不仅没有自贬身份，而且为中国妇女解放平添了一段佳话。中共“一大”中虽然没有女性的正式代表，但王会悟的作用足以证明，妇女在建党方面的贡献，并不让须眉。

在她俏丽的身后，各路精英商讨着一件救民于水火的惊天大事……

7 月 31 日下午 6 时许，就在南湖夕阳西下的时候，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了。

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虽然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

他们的缺席都直接与金钱有关。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着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

府拖欠教师的工资。

拖欠教师工资、给教师“打白条”，在中国由来已久。此时北京的国民政府拖欠北京各大学的教师工资已达数月之久。为了讨要赖以养家糊口的薪水，即使是大学教授也顾不上斯文，成立了“索薪会”，联合起来跟政府交涉。“索薪会”的主席马叙伦恰巧生病，李大钊便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所以脱不开身。

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

送钱来华的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

几位关键人物的缺席，不免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有一丝遗憾，彼此之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一大”之后，中共中央有了正式机关，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附近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马林提出，要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做党的专职工作，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重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马林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并不满意，他们差不多都不脱学生本色，尽管对革命热情很高，但社会斗争的经验不足。

重阳节前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党务。党的领导工作虽然加强了，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与处事低调而谦和的吴廷康截然不同，马林自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启动资金，行事风格难免表现出傲慢和专横，不太尊重中共中央。如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的问题上，马林越俎代庖，在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派他的翻译张太雷前往参加，这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十分恼火。

性格孤傲的陈独秀不买马林的账，中共中央曾经试图缓和两人关系，先是让李汉俊与马林商谈，但李汉俊与马林也发生了争执，调解宣告失败。又派与陈独秀和马林接触比较多的张国焘出面，也没有成功——一边是恩师，一边是共产国际的特使，张国焘说谁都不合适，只好耍起了滑头。最后还是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出面斡旋。张太雷因家里贫穷，考上北大之后交不起学费，只好上了公费的北洋大学，因此他不是陈独秀的门生。

在张太雷的撮合下，陈独秀和马林总算见过两次面，两人不仅没有谈拢，而且矛盾更深了。到后来陈独秀干脆拒绝与马林见面，并闹到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的地步。

除了性格之外，两人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分歧巨大。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如此一来，共产国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经济上资助中共。陈独秀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

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中共在建党初期无论是经验还是经费都十分欠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无论在政治还是在金钱上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党内的年轻同志都劝陈独秀从长计议。有一次在陈独秀的办公室内，张太雷劝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太雷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就发起火来，打断了他：“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惯。”说完，陈独秀拿起帽子就要走。张太雷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但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拂袖而去。

分歧归分歧，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由此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新青年》杂志的缘故，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马林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知这一情况之后，四处奔走营救，花重金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巴和（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同时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组织中共中央对“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不过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此前，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部分经费，往往是经苏联驻中国的华俄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直接转交的。

在马林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后来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缓和，陈独秀与张太雷的关系也有所和缓。但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年轻同志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印象却难以消除。

张太雷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关系不错，张太雷曾经主张以陈延年代替陈独秀做中共的最高领袖，陈延年并没有接受，是不是因为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缘故，不得而知。

第二章　输血与造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 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

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来设在马神庙的“四公主梳妆楼”，最初并不对外开放，只有教授和少数几个与管理人员相熟的学生才能进去看书。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图书馆搬到了沙滩红楼的新校址，占了整个红楼的第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东南角的两间大房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报纸杂志，更是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

如此一来，图书馆原有的人手不够用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 年的金秋十月，一位身材高挑、面目俊朗的青年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这位青年就是湖南的毛泽东，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来北大图书馆打工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有身份的人介绍，俗称殷实铺保。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两人有翁婿之谊，知根知底，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并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有八元，跟北京拉包月的车夫差不多。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当孤儿院的管理员每月也能挣十元，长沙楚怡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重点小学）的教师每月也能拿到二十四元的工资。

毛泽东来北京打工，并不是为了钱。

古人云“三十而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算是大龄青年。他九岁才开始启蒙，在韶山的私塾里学会了打珠算，为的是给家里记账。一般贫苦农民家里是用不着学珠算记账的，这证明毛泽东的家境还算富裕。按照他父亲的规划，长子毛泽东的职业已经定位于农村的管账先生，从此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素有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如何肯做田舍郎了此终生？

自己未来究竟怎样发展，毛泽东有过多种考虑，如上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

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甚至肥皂制造学校，都列入过计划。他最先尝试的是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准备学习经商之道。不料考中之后，毛泽东仅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

为何没有选择学习商业？毛泽东曾向他的同学张昆弟私下透露过想法：“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只是把经济当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他并不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而是放在更高的追求上。

于是毛泽东又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即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考试成绩居然是第一名。精明但短视的父亲拒绝继续供给毛泽东生活费，卡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啃老族”，毛泽东决定经济上自立，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 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 1963 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920 年 11 月 7 日和 9 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示，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

〈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 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仅就金钱而言，单凭某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共产主义者个人也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负担一些开支。在北京上学的外省学生节衣缩食，将自己享受的公费助学金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些文笔好的学生将自己在报刊上投稿的稿费也捐献出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